

指尖上的“烟火”

洛水

父亲嗜烟。一辈子和烟影形相随,执烟的手,都磨出了茧,老而弥坚,金光灿灿。

父亲沉默寡言,最活泛的就是那身烟熏火燎味了,人未到味先闻。有事没事,都点一根烟,端坐在云雾里。他神色安宁、静穆,像得道的佛。母亲却见不得他抽闲烟,支派他干这干那。他不恼,不急,缓缓抽完最后一口,在地上摁灭,又生龙活虎,猴子出山一般。

儿时,父亲就是我心目里的齐天大圣。他指尖的烟犹如金箍棒,云里雾里,忽长忽短、变化多端。我心驰神往,鞍前马后地递烟、点火。然后,虔诚的道童般,看他悠然地

腾云驾雾。忽然,一声霹雳:你爷俩还不干活去!抽,就知道抽,过来我抽两巴掌……

不用看,也知是母亲。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母亲就是父亲外的人和天,是那会念“紧箍咒”的唐僧。每此时,我都很没义气,脚底揩油,溜之大吉。若被抓住,就更没义气地控诉为父亲指使。父亲竟也自毁形象,辩称为我蛊惑。最后,各打三十大板,不了了之。

母亲的巴掌暴风骤雨,落在身上,却很轻。我和父亲相视一笑,信誓旦旦地悔过。

但父亲从未真正悔过。母亲的“紧箍咒”,治标不治本,他总有应对的办法。母亲常感慨,父亲对烟的感情比对她还深!或许吧,在遇到母亲以前,他就已和烟相依为命多年。

那晚,马棚里,父亲刚写完作业,大伯摸进

来。父亲要去添草料,大伯制止了,递来一支烟。父亲怔住,望向大伯。大伯没说话,给他点上烟。父亲抽一口,呛得泪水涟涟。灯光昏暗,土墙上,兄弟俩的影子一片凌乱。第二天,父亲没有去上学,到生产队上工了。

那一年,爷爷奶奶相继去世。大伯要教书,二伯正读初三,家中需要人挣工分。

那一年,父亲十二岁。抽了烟,就算大人了,要担起大人的责任,也再离不开烟了。

父亲常说田里守夜的糗事。乌漆墨黑,他卧在草棚里,一根接一根抽烟。有时,过路的人会摸进来坐,借个火。父亲的光头铮亮,他们喊他大爷。父亲应着,只顾寒暄,也不管他们是人是鬼……。我听得毛骨悚然,父亲付之一笑。都过去那么久了,他还笑得那么孤独。

后来,有了母亲,有了管他的“咒语”,有了吵闹温暖的家……。但父亲仍离不开烟。

春节回家,一家人看《三打白骨精》。我说,孙悟空也是的!干嘛要听唐僧唠叨,八戒挑唆?一个跟头过去,取经还不分分钟的事。父亲笑笑:是呀,但然后呢?我说,就功德圆满了呗。父亲给母亲盖上棉袄——她又睡着了,接着讪讪道:但那一辈子该多无聊啊!

是呀!若母亲不唠叨,我不搅和,该多无聊啊!就像那些黑夜,父亲孤独地守着庄稼。

我给父亲点根烟。他指上的橙黄,像金箍,封存了多少时光?父亲递过一根烟,我摆摆手。我的指上同样有个金箍——婚戒。尽管它们质地不同,但有着相同的承诺和希冀。

家有“老公主”

张燕峰

前天,哥哥在家人群里发了一段视频。画面上粉白的墙壁上妖娆着一朵朵小花,疏密有致,摇曳生姿,颇为动人。透过那扇窗,我辨认出这是母亲的房间。

半个月前,母亲去了姐姐家。想象一下,当母亲回到家里,看见焕然一新的房间,看到粉白的墙壁上盛开着的鲜艳花朵,会多么惊奇,多么欢喜。一想到母亲那既惊且喜的神情,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去年,父亲离开了我们。全家人都很悲痛,当看到白发如霜的母亲悲伤而落寞的神情,我们心中更是如针扎一般。现在,我们做的就是照顾好母亲,让她在失去伴

侣的孤独日子里安享晚年。这也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报答,最好的怀念。

我说,妈,过去有爸爸的拖累,您哪里也去不了。现在,您有什么心愿,我帮您实现。

母亲略一思忖,便开了口,有一个大表妹,30年没有见面了,不知是不是还活着?母亲微皱着眉头,眉宇间有着隐隐的担忧,也有浓浓的期待。

我马上拿起手机,给几个朋友打电话。几经辗转,终于打听到这个大姨还健在,住在邻县的乡下。

于是,我很快安排她们见了面。在去看大姨的路上,母亲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兴奋,急切且不停地问我,还有多少里?

这对3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姐妹,见面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聊着,似乎要把积攒多年

的话一下子向对方倾诉完。儿时温馨的时光,几十年的人事沧桑,酸甜苦辣,都在她们眼前闪过——时而热泪,时而叹息,时而大笑。

从大姨家回来后,母亲给健在的阿姨和舅舅们打电话,与他们一起分享与大姨相见的喜悦。

看着母亲兴致勃勃的样子,我说,妈,以后您想见谁,咱就见谁;您想去哪里,咱就去哪里。

母亲脱口而出,说想见你姑姑了,她腿脚不好,也不知道能不能走路了。

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,与母亲感情一向甚好,居住在大同市,算起来与母亲也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,难怪母亲思念她。

行,一定带您去大同!

母亲咧着嘴笑着,那表情就像一个要求

得到满足的小女孩,道道皱纹舒展开来,眼中闪耀着明亮欢喜的光芒。

母亲已经86岁了,但我们每次给她买衣服都要买那些时尚的衣服。还没有入秋,我就给母亲买了一顶红色宽边棉布帽,还有一件银灰色的毛衣。母亲美滋滋的,在镜子前照了又照。

多漂亮呀,像一个美丽又时尚的老公主。

老公主?老妖精还差不多。母亲说着,边忍俊不禁,拍着手大笑起来。

是的,自从父亲走后,我们把母亲当作公主来宠。家有老公主,让我们兄妹的心靠得更近,贴得更紧:时常隔着万水千山,在电话中商量怎么给母亲过生日,怎么给她制造意外的惊喜,怎么让她穿得更舒适,怎么满足她的心愿……

秋天

秋天落在裙子上

吴赵男

风
穿过金色的海洋
微笑成星光
在四季吟一杯酒
微醺
写下秋天的诗行
落在裙子上

雨
抱紧风的记忆
在漫天雨雾里舞蹈
添一轮清凉的月
在半绿半黄间
洗去尘埃
与秋雨相吻

我
站在拐点处
与时间对坐
翻开心灵的扉页
用寂静
打开秋的裙摆



清气 孔祥秋 摄影

中关村往事

欧阳

消息说鼎沸中关村经年的鼎好电子商城关了。获悉此事,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映出昔日繁华的画影,一时竟有些唏嘘。

鼎好大厦据称总商业面积有10万平方米,集中了全国各主流IT品牌和各种电子产品,有近2000多家商户扎根其中,可以说是北京乃至全国汇集厂商(品牌)最多、服务项目最全,展示、销售、服务集于一体的超大一站式电子主题商城。

曾经的中关村,除鼎好外,航母级的场所还有海龙、太平洋和科贸,以及附生的二手耗材市场。在其繁盛的时日,不仅每个市场内人头攒动,楼外穿行的人也是摩肩接踵。初时因为品牌电脑昂贵,各路自攒电脑的大侠便蜂拥而至,与各色各样的经销商、代理商、批发商、零售商和快递运输

队伍一起,在黄庄以北、北京大学以南的中关村大街及其周边区域的每一寸土地上,一刻不停地留下重复踩踏的脚印。

对此,我有切身经历,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在海龙攒的。其后,自学“成才”的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,先后自己动手攒过三台电脑,并有两次自主升级(换主板、CPU什么的)的体验。其中的原因,一方面是好奇——想了解电脑,另一方面是对中关村市场的信任。

自己首次组装电脑很谨慎:托了个科贸里上班的兄弟带路。“你要什么配置跟他说。”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一摊位后,扔下一句话就准备转身走人。这不会有问题吧?“不会!尽管放心。”接下来就是说我的电脑配置。摊主建议我换主板和机箱:“那款机箱电源有点紧张,主板兼容性不好。”新手我只能听之任之。随后没多一会儿,他就从不同摊位拿回了各种配件。熟练的他带着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生产出了新电脑。从其间咱俩的对话中得知中关村是守信誉的,“旧货就是旧货,行货就是行货,没人骗你。”摊主说。

后来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说法。

第二台电脑时,店家建议我拿便宜一

两成的“水货”硬盘:“绝对没问题!有问

题你随时来随时换。”确实没问题。随着业务熟悉,去中关村的次数有增,像主板、显卡升级什么的,有时候啥业务也不做也会去那里转转。再后来和海龙的一位小掌柜熟识地有了联系,再去市场都去瞧瞧他,多数时候要什么东西都让他帮我拿,也聊聊电脑的事儿。后来随着CPU接口的变换,我在他那儿攒了第三台电脑。没多久见度娘上说那批主板有问题,就给小掌柜去了电话,让他看看。“我给你送新的来,让送货的把原来那个带回米。”当天下午新主板就安装在了我的电脑里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大概有五六六年吧?我想买台新的音箱,去了市场才发现卖相机、手机拉客的成了卖家的主力部队,而我要的音箱,相同品牌的产品各家报价差异居然很大。这让我困惑。一问小掌柜才知道彼时已非彼时。“现在假货多得很。”他说,说是店家和人都换了不少,没换的也变坏了。你也变坏了?我问他,他没理睬我。

一年多以后,我有一次在书店看见U

盘很便宜,买了一个,结果回来发现存不进东西,用软件检测,主控芯片全是乱码——显然是假货。看来还得麻烦小掌

柜。结果小掌柜那里拿回来的U盘一个熊样。“你得给我行货。”我电话小掌柜说。没两小时快递就来了,给了我三个一模一样的U盘。怎么回事啊?小掌柜说钱不退了,你看哪个能用吧,他也被坑了。“从二级代理那儿拿的货,想不到他们也干这种事情。”他说。

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,但此后我也没进过海淀的电子(耗材)市场。

前阵子骑车路过中关村,发现萧条得不成样子,心里正想着或许也是疫情惹的祸。也是巧了,没两分钟就在黄庄路口碰到了住那边的教授兄弟,随口就问中关村怎么那么清静了。

本来人就不多,海龙关闭后人更少了。教授说。

海龙关闭了?什么时候的事儿啊?

好些日子了……

有人说线上卖的风生水起,实体店难以为继,但也有观点认为陷阱太多太大,是大家伙合起来把自己个儿整坑里了。可能两方面原因都有吧。

不过,不管怎么样,曾经的时代巨幅风景,虽然拥有高科技的名号,但却一直难以去掉杂货铺的影子,这样的繁荣恐怕早晚都会谢幕吧。

鲁北

周末,我驾车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。途中,临近村庄的时候,看见近处的路边、或不远处的庄稼地旁,有大片的野草,绿油油的,被风一吹,摇摇摆摆,没了魂儿似的。我大发感慨,对坐在身边的妻子说,那时候,怎么没有这么茂密的野草呢!

那时候,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对野草情有独钟,田间蔓草,就是我少年时的情人。

那时候,我十二三岁,弟弟八九岁。放学后,或者节假日里,我们的主要任务,就是割草。似乎村里长大的孩子,都有割草、剜菜的经历。大约半个小时,我们可以割十几斤青草,大都是茅草或蔓草,捆起来,背回家。

从夏天到秋天,我们几乎天天重复这样的劳动。

有时候,我们也给生产队里割草,生产队里养着牛、喂着马,靠着这些大牲畜犁地、拉车。

家庭妇女也忙里偷闲,去割青草。

住在我们西南角的李姓人家,娶了外县的媳妇,长得有几分姿色,常常引得村里的小伙子们神魂颠倒,见到时,总会多看几眼。我们的小村,远离县城,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村,难得见到这样一个杨柳细腰、错落有致的女子,特别是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垂在腰际,韵味十足。她也割青草,割得并不多,却比我们的斤两重。我发现,她的草里不干净,常常有土坷垃混在里面。从此,我感觉她没有以前美了。

在乡下,中小学生一年放三次假,麦假、秋假、寒假,不放暑假。麦假时间短,我大都帮着父亲收小麦。秋假时间长,我在帮着父亲侍弄庄稼的同时,也割草,但主要是割草。能割草的地方并不多,也就是庄稼地边,水沟旁,或者撂荒地里。那时庄稼长得不好,草也不茂盛,割草,是我犯愁的事儿:割是一个方面,草是一个方面,草被生产队的牛、羊无数次的践踏,很难找到成片的草,茂盛的草。

有一年,我们割的草,晒干了,垛起来,像两座山。入冬的时候,父亲把那些草卖了。用卖草的钱,买回来200斤粮食,我们全家人吃了一个冬天。

那时候的草,十二三岁。那时候的我,也是十二三岁。

如今,路边、沟旁、地沿上的那些草,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。但看到那些草,我还是心怀欢喜。

心头那双草鞋

陈甭

早年的农村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草鞋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那时无论男女老少,不分晴雨霜雪,村民外出干活都穿着一双草鞋。

像许多的农村孩子一样,我对草鞋有一种本能的抗拒。孩子细皮嫩肉的穿着硬邦邦的草鞋,一双小脚丫总是被磕得满是血泡,火辣辣的痛,我是宁愿赤脚也不愿穿草鞋的,觉得赤脚比穿草鞋来得自由舒适。

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好农民,他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本分,做农民就要从穿草鞋开始,什么时候学会穿草鞋了,儿子就像个农民了。

父亲给我做草鞋时特别用心,精心选择一捆稻草反反复复地捶打,有时还会掺和一些碎布条,尽量把草鞋做得柔软舒适一些,他把对儿子的全部希望揉进了一双草鞋。不过穿上草鞋我还是会发怵,不到万不得已,我是能不穿草鞋就不穿草鞋的。

像所有母亲都要教会女儿做布鞋一样,我十来岁的时候,父亲就开始教我做草鞋了,父亲觉得做草鞋如同耕田、插秧一样,是农民的看家功夫,一个人做不好草鞋,儿子连同父亲都会被人瞧不起的。

做草鞋的难度是要把草绳搓得匀称、编得紧密,草鞋要做得大小适中,契合脚的模样,并在草鞋的边沿分别对称编出六个襻(纽),便用一根绳子牢牢缚住脚板,一双精巧的草鞋其实也是充满灵气的。

我从小有些笨手笨脚的,草鞋做得松松垮垮的,几个襻都做得东倒西歪,做出来的草鞋都是次品,上不了脚。可父亲还是极其耐心手把手地教我做草鞋,一次又一次,他真心想把自己的好手艺传授给我。做得多了,我就喜欢上草鞋了,这大概算一种日久生情吧,草鞋成了我心头的一种牵挂。不过后来我开始认真读起书来,再也没有做过草鞋。

去大学报到的那天,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大箱日用品,表哥把那双结婚时才穿过一次的皮鞋送给了我,父亲默默地把我送上火车,临走时父亲摸摸我的头说,老爸只送你一句话,以后穿了皮鞋也不要忘记你穿过草鞋,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。

草鞋是我们老祖宗的一大发明,据说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。草鞋,最早的名字叫“屨”,相传为黄帝的臣子不则所创造,但我坚信草鞋是农民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,就是缺草鞋。即使在山区农村也很难再见到有人穿草鞋了,琳琅满目的鞋子反映出今天我们物质生活的富庶多彩。而草鞋成了某些博物馆、农家乐的一种装置,或者某些时装发布会的点缀,透析出当代人一种崇尚怀旧的心理,虽然有些突兀、有些违和,但是见到几乎销声匿迹的草鞋,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、亲切感,总觉得有一缕草木、泥土的芬芳从心头飘过。

在日益返璞归真的今天,原始、朴实、粗陋的草鞋会不会卷土重来?谁也说不定。



秋色

郭建良 摄